

编者按：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经常性工作，也是全党同志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内在要求。深入把握党章的要义是每个党员的基本功和必修课，学好党章必须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

学习党章的方法

□ 邵云峰

党章的与时俱进从一个独特的维度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程，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中的重大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都体现在党章中。党章是党的总章程，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因此，深入把握党章的要义是每个党员的基本功和必修课。对于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而言，需要不断地温故知新，始终不渝把党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和精神追求，自觉做到深学细照笃行。

逐字逐句学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逐字逐句学党章，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挤出时间、拿出精力，带着感情、带着敬畏、带着责任，通过逐字、逐句、逐条学习，使党内容入脑入心。

坚持真学真悟。古人云，为学全在精神，精神不足，未有能成者。学习党章，需结合党的历史、党章的发展史深入学习，不能认为学不学一个样，也不能应付检查摆样子学。应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自觉把党章作为政治理论学习的必修课，做到学原文、读原著、悟原理，实现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真正让党章入脑入心、入骨入髓。

坚持动笔真记。党章内容丰富，字字句句含义深刻，如果只是有时间就溜一眼、看一遍，浅尝辄止，就不可能记得全、记得牢。只有时常静下心来，挤出更多的时间，把刻苦学、用心记作为习惯，将学习党章挂在心上，落在学上，反复划线理解，遇到疑问记下来，有了心得写下来，才能真正做到读懂记牢、学懂弄通。

追求领悟真谛。党章虽然通俗，但思想深邃，自成体系。只有把学习党章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结合，特别是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and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相结合，同自身的工作实际相结合，做到边学、边思、边悟，才能在学思践悟中实现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笃行的目的，真正把握党章的精神实质。

带着问题学

党章是一面镜子，能否按党章要求解决存在的问题，是对党员干部学习成效的直接检验。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对照党章要求不断改进、不断创新，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难题转化为学习重点，把学习的过程融入解决问题的过程，防止和克服“学习归学习、工作是工作”的“两张皮”现象。坚持深入查找存在差距，对照反面典型深挖问题根源，逐一研究制定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进一步厘清思想上的模糊认识。深

入剖析问题，坚持做到找问题、查根源、抓整改。

把党章作为信仰“基线”，夯实忠诚于党的根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纯洁性来体现，不注重经常学习党章锤炼党性，就会导致思想无根、理想无魂。只有把学习党章当作人生的必修课，才能把党章的要求内化为守纪律讲规矩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导向，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思想根基。

把党章作为言行“界线”，树起问题导向的镜子。党章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是广大党员的行为标尺。尊崇党章，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把问题摆在面前，党章为所有党员立起一面“明镜”。党员干部要经常对照党章自查自纠，要让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成为工作生活的自觉和自愿，做到“立心”“立言”与“立行”统一，不断锤炼作风。

把党章作为清廉“红线”，扎紧从严自律的笼子。“木有根而枝茂，水有源而流长。”抓住根本，才能管长远、纠彻底。学习党章就要按照党章这个党的总章程，从源头把牢正风肃纪的方向，时刻盯紧权力运行的轨道，扎紧制度体系的“笼子”，始终把廉洁自律作为嘉言懿行第一要义。

细照笃行学

唯有学懂悟透、敬业实干，方能担

当责任、落地生根。学习党章的根本目的在于学以致用，最终要见诸在践行党章的行动之中。广大党员干部要敏学致用、细照笃行，自觉依照党章，在学习、实践、修身中陶冶情操、砥砺品格。

坚持“务实心态”。“务实心态”是笃行党章的基础。这需要党员干部以务实、严肃的态度，坚定地维护党章的地位、作用和权威。要实事求是地查找自己践行党章方面存在的差距和不足，认真分析原因，制订切合实际的措施，使学习实践党章真正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见真实效。

坚持“求新姿态”。“求新姿态”是笃行党章的关键。在细照笃行过程中，需坚持与时俱进，在学习党章的形式上、方法上树立“求新理念”，不断探索新理解、谋求新方法、务求新成效，创造性地学习、遵守、落实党章的各项要求。

坚持“实干状态”。“实干状态”是笃行党章的根本。学习践行党章的根本在于提振精神、真抓实干、落到实处。要把笃行党章落实到党员干部的思想、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竭尽全力干活、做事。用心、用力、用情，始终保持敢于担当、开拓创新、求真务实的精神状态，以“细致、精致、极致”的标准，夙兴夜寐，加油实干。

学而思

回望司马迁的史学精神

记》以继《春秋》，其述作依乎经，其议论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损益之，遂为史家之宗。”“继《春秋》”何以成为司马迁之志？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父亲司马谈之临终遗命，强调接续孔子作《春秋》之功的历史使命。所谓“司马迁之志”，其实就是对历史书写的意义和价值不顾一切地追求，包含着对历史本质的终极追问、对历史精神的不断反思，体现了历史写作主体的精神自觉。书写历史的人就是理解历史的人，理解历史的人就是创造历史的人。呈现什么样的历史取决于书写者认识历史、表达历史的广度和深度。司马迁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强大解释力来自于他所坚持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

“继《春秋》”既体现了对历史的敬畏和敬重，又体现了历史理性和反思精神，它已经超越了治世立功的理想抱负，表达了回归史学家本来职责和天生使命的努力。历尽磨难、秉笔直书，既是对历史真相不懈探求，也是历史书写者与历史本身的融合。也可以说，“继《春秋》”既是使命的传递，也是生命过程本身，历史理性与人生经验、历史精神与生命精神实现了高度契合。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在司马迁看来，记录历史、警醒后世是关切现实、延续生命的一种方式。《史记》是司马迁的生命寄托，也是毕生使命、身后荣辱之所在。

批判与建言：历史的“钢琴师”

历史不是一堆毫无关联的事件和人物，也不是封存在岁月深处的陈迹旧踪，而是蕴含着意义和价值的无声表达，是意味深长的暗示和启迪。司马迁是历史的“钢琴师”，他所面对的是一部波澜壮阔、生动鲜活的历史。他不是站在历史之外看历史，历史就是他的生命，他敏锐地感知每一历史变动，而是把认识历史、理解历史作为精神使命、历史责任。挖掘和揭示历史对现实的批判性、历史对未来的隐喻性，可能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工作，但这正是史家的本分。

后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

释：“史，记者也。”这是一种现象层面的表述，历史显然不仅仅是对历史事实的叙述，更体现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和讽喻。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将其史学追求表达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究，不仅是追本溯源的探究，更是一种形而上的哲学追问；通，不仅是融汇古今的贯通，更是一种打破隔阂的广博学识。《史记》中充满了感慨和追问，感慨人事、追问道，终成拨乱反正的一家之言。

历史是现实的镜鉴，从历史发展轨迹中我们可以更加透彻地认识现实，更加敏锐地感知未来。司马迁既强调史家用自己的方式书写历史的独立性，又透露出历史守望者的孤独和坚韧。历史大潮裹挟着泥沙滚滚而过，思想家的“一家之言”却傲然挺立。陈文洁说：“司马迁的一家之言以揭明治乱成败之理为务，旨在古为今用，为现实服务。”历史是要考察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和人类社会活动规律的，关切人类的命运和未来。探求历史其实也是关注现实的一种方式。只有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获得启迪，才能够变得清醒和睿智。陈文洁认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表明了司马迁修史的目的在在于澄清治乱成败之源，探明为治之道，以纠时政之偏弊。司马迁以察其始终的态度解读历史，以批判现实的勇气叩问历史，救时之志溢于言表。司马迁深切了解政治现实，却又站在现实“之外”，通过深观时变，冷静观察人性世情之实，以史学家的察古知今推动现实政治的进步。正如陈文洁所言：“《史记》于现实治政，既有批评，也有建言——从效果上看，批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建言。”无论是对汉武帝伐伐的批评，还是对《禹贡》九州之治的推崇，都体现了司马迁恤民生而慎兵事的政治理想。

精神格局：孤独的超越者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司马迁之志成就了一个伟大的史学家，也大大提升了那个古代史学的境界。正是由于担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司马迁才获得了参酌古今的开阔视野，拥有了“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的博大史识，最终成就了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历史抱负。

司马迁的历史观是大历史观，他的眼界和高度来自其作为大历史学家



的沉静和深刻。述往事、思来者体现了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精神格局。司马迁的“实录”说到底是对“继《春秋》”这一使命的自觉担当，“不虚美，不隐恶”不仅仅来自洞察历史真实的穿透力，而且也来自对历史大势的宏观把握、对经纬万端的历史风云的深切洞察，从而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理清脉络、发现规律、叩问得失。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找出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和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司马迁以“每用虚字诞语翻弄”的审慎态度对待史料。《太史公自序》中写道：“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司马迁意识到，欲实现“继《春秋》”之志，必须超越个人都怨，以严苛的目光考量兴衰之乱。

《史记》的精神格局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历史著作，这也应归功于他所处的那个据旧鉴新、更始通变的时代。葛兆光认为，司马迁在汉代盛期书写的《史记》，超越了《尚书》（文件汇编式的历史），《国语》《国策》（拼合式的历史），《鲁春秋》（诸侯国即地区式的历史）等的历史书写方式。因此，才有周边（大宛、匈奴）、有源头（三代本纪）、有不同阶层（世家、本纪、列传）和不同领域（各书）。这种笼罩天地、铸造古今的“历史”，其实，正是这一庞大帝国伟大历史的记录和反映。没有那个气象恢宏的时代，就不可能有《史记》这部博大精深的伟大作品。

名家治学

报刊聚焦

《中国共产党干部论坛》2017年第2期聚焦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 胡秀荣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应审慎、稳妥推进。2016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意味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正式启动。今年年初，三省市监察委员会的正式成立，标志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更好认识和把握这一重大改革，本刊策划专题，对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监察委员会的职能是什么？职权如何配置？中国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吴健雄指出，监察委员会是反腐败专门机构和监督执法机关。监察委员会监督执法职能的明确，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督执纪职能相对应，形成党纪与国法相辅相成、党内与党外双管齐下的腐败治理格局。监察委员会行使的监察权包括监督、调查、处置三项基本职权。其中，监督权是基础性职能，调查、处置权是主导性职能，是监督权运行的刚性支撑和重要保障。

如何认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最根本的保证是党的统一领导。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其他领域的改革事业一样，都需要一个统一领导权威作为保证，用权威力量维护改革的政治性和方向性，综合不同的改革观点和政策思路，对具体改革疑难问题作出解释并加以解决。

如何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全程纳入法治轨道？中国政法大学的副院长焦洪昌及其博士生叶远涛撰文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地位要求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每个时期都要体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威性，且主动发挥作用。从改革试点的启动来看，试点方案首先要得到全国人大的授权才能启动，各个试点地方人大也要出台相应的具体措施让整个试点改革于法有据。

如何认识邓小平的制度监督思想与设立监察委员会这一重大举措的关系？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指出，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提出的“制度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越来越得到改革开放实践的检验。监察体制改革不仅是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全面从严治党最重大的举措，还是由同体监督转向异体监督、由治标为主转向以治本为主、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并通过改革“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的最重大利好。

我国行政监察制度和党的监察制度及其关系经历了怎样的演进和变迁，中国古代建立的监察制度有何特点，近代以来又经历了怎样的传承和发展？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和把握正在推进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纪亚光、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副主任储建国、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何勇强分别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论证分析。